·社会学研究·

DOI:10.20004/j.cnki.ujn.2025.05.008

流动社会学视角下县域人口要素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

林聚任,张　璐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需解决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其中人口要素是核心方面。基于城乡融合发展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流动社会学视角探究县域空间内人口要素的流动类型特征及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分析这种影响存在的流动类型差异和县域空间差异效应。研究发现当前县域空间人口要素流动呈现多元化、常态化特征;县域空间内人口要素流动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影响极大,有助于城乡空间结构关系的调整与整合。尤其是近年来城乡穿梭型流动人口的增多,不仅改变了城乡人口的空间分布,而且使城乡分割的空间界限逐步消弭,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需要进一步关注县域城乡人口要素双向自由流动,持续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关键词]人口要素流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流动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25)05-0072-11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作为其必然要求,需解决城乡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其中人口要素流动是一个核心方面。近年来城乡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人户分离人口49276.25万人,流动人口中以省内流动为主,共25097.96万人,跨省流动人口12483.72万人,跟2010年相比,流动人口增长69.73%①。进一步从县域人口变动数据分析来看,县域常住人口虽有所下降,但是县域内城镇常住人口增长明显。有学者把县域人口总量减少但集聚水平提高的状况称为"集聚式收缩"②。此外,我国在日益重视"人的城镇化"的政策背景下,人的流动与经济社会活动的空间聚焦与重新布局,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正由规模扩张为主向质量提升为主转变,由以物的城镇化为主向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转变,由以城乡人口迁徙为主向城乡和城城人口流动并重转变,由以单个城市为主体形态向以城市群为空间载体转变③。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以人为中心的各种要素的流动,无疑深刻重塑城乡空间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社会学研究"(项目编号:20&ZD150)。

[作者简介]林聚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璐(通讯作者),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箱:zhanglu.bb@163.com。

①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年版,第81页。

②雷刚:《城乡融合中的县域人口集聚式收缩:影响及应对策略》,《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4年第11期。

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决策支持大数据实验室:《迁徙的人 变动的城:大数据视角下的中国城镇化》,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

结构关系，有助于改变城乡分割局面，成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可以说，中国已步入高度流动性的发展阶段，流动因素成为重塑城乡空间结构的重要力量。乡城间人口及其他要素的流动不仅改变了城乡人口的空间分布，而且使城乡分割的空间界限逐步消弭，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各种新的可能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也突出强调了人口要素流动性的重要意义："我们把发展看作是促进人们自由地过自己选择的生活，把流动性看作是这种自由选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人的流动涉及流动者和驻留者双方面的权衡取舍，而对这些权衡取舍的理解和分析是制定适当政策的关键。"①

已有研究虽然从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角度，探讨了中国城乡人口流动的发展趋势及其对社会的深刻影响，但以往研究或着眼于全国性、区域间人口迁移的宏观空间尺度分析，或侧重于对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乡—城流动人口本身微观问题或进城生活状态的分析。而本文基于流动社会学的视角，把人口流动看作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分析人口要素流动的不同类型及其影响机制。此外，从研究的空间尺度来说，将从中观尺度聚焦于县域人口的流动状况及其特征，分析县域人口要素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关系。在当前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格局中，县域高质量城乡融合发展对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②。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性："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推进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等县域统筹，把城乡关系摆布好处理好，一体设计、一并推进。"③这说明了县域空间在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一）城乡人口要素流动与类型

在国内相关研究中，一般将是否发生户籍变动作为人口迁移与流动的区分标准，而流动人口的界定更为宽泛且具弹性。实际上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出现了越来越多"人户分离""城乡两栖"等现象。本文所关注的人口要素流动并不限定于人口学意义的户籍变动和人口迁移，而是将人口看作城乡发展的要素加以分析。从流动社会学角度来说，"人口要素流动"包含了跟人的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类形式的变动。于城乡空间而言，城乡间人口要素的流动成为城乡发展的重要方面，极大地影响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对此，本文并非单纯关注农民工的乡—城流动或进城人口的融入问题，而是把人的流动看作重构城乡空间结构关系的重要因素，侧重分析不同类型的人的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由此，本文按照乡—城人口流动的特点将其分为如下三种类型。

1. 农村留守型。这种类型指的是长期生活在农村或极少离开农村有乡城流动的人群，本文主要将其作为其他两种流动类型的参照组来做分析。这类人群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往往有明显的年龄和性别特点，选择生活在乡村的"留守"人口是乡村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④。有学者基于全国10个省份的人口流动监测调查数据，对留守的农村人口转移能力、转移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发现，虽然农村地区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但留守人群转移意愿偏低，且不同城镇化地

①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Overcoming Barriers: Human Mobility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 8.

②林聚任：《以高质量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年第21期。

③习近平：《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论"三农"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6页。

④陆继霞：《当前乡村人口的变化趋势及应对》，《人民论坛》，2024年第10期。

区呈现出差异化的转移意愿模式[①]。这类人群是农村的“守望者”,尽管其总量不断减少,但仍是当前农村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

2. 城乡穿梭型。第二种类型是因工作、家庭生计和其他生活需要而往返穿梭于城乡之间的流动人口,他们具有“城乡两栖”或“候鸟式”特征,流动方向上呈现出明显的双向性。他们看起来没有离开农村,但也没有完全定居于城市。据研究发现,2010—2020年新增县域城镇人口中约3/4为县域城乡两栖人口,这类人将会在县域内长期大规模存在[②]。他们的生活趣向、身份归属空间不再限于一城一地或者一村一地,而已跨越传统的城乡边界和区域边界[③]。这种流动类型使得在更大的空间内,产生“一种具有空间延展性的新型城乡家庭形态”[④]。还有研究显示,当前的城乡人口流动正从被动选择转变为主动选择“城乡两栖”,“从之前的‘进城不能落户’转变为大部分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城不愿落户’”[⑤]。此外,近年来虽然国家鼓励人们返乡创业,但部分所谓的“返乡人”面对“城市留不下,农村回不去”等困境问题,实际上也不能完全回到乡村。尤其是新生代的县域农村青年,他们即便出生在农村,但更多的是选择进城务工或往返于城乡间工作、居住,“离土离乡”仍是农村青年的主流选择[⑥]。我们把所有诸如此类的流动人口称为“城乡穿梭型”。

3. 进城定居型。这一类型指原农村人完全离开乡土,在城镇落户定居,实现了户籍地、工作地和居住地由乡到城的完全转变。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不断推进,这类人群占比越来越大。他们除了有部分人在大中城市定居外,很多较发达地区农村人口在县域内实现了就地就近城镇化。有研究指出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定居是发展趋势,且县域城镇尤其是县城已成为农民就近城镇化的首选地点[⑦]。县域城镇定居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县域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带来更多的就近就业机会,大城市扩展和县城房地产的崛起,也使青年在县域范围内流动明显增加[⑧],而中小城市或县城成为了“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实现体面进城的最优选择”[⑨]。另一方面,由于城乡教育资源的差异,大量农村人口为了使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而举家进城定居。这一类型的人口流动实现在城镇定居安家,直接推动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本文将其称为“进城定居型”。

(二)人口要素流动与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近年来随着社会学研究的“流动转向”,流动性问题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其中,英国著名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等所倡导的“流动社会学”[⑩]和“新流动范式”(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⑪],为我们研究当前人口要素流动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流动社会学所关注的流动性,包含了不同时空下各类人、物以及信息的流动,这构成社会发展与变迁的重要力量。在当前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和城乡空间结构重构中,人的要素流动具有核心性作用。已有研究从不同方面关注人口流动性因素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性。如有学者指出,农

---

①齐嘉楠,刘鸿雁,李伯华等:《农村留守劳动人口转移意愿研究——基于十省流出地的调查》,《人口与发展》,2021年第1期。

②苏红键:《中国特色的县域城镇化:以城乡两栖促城乡融合》,《甘肃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③王春光:《第三条城镇化之路:“城乡两栖”》,《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④董磊明,张徐丽晶:《进城购房、城乡延展与乡村“溶解”——江苏湖村农民城镇化的实践分析》,《开放时代》,2020年第4期。

⑤苏红键:《城乡两栖的内涵转变与市民化战略转型》,《学习与探索》,2024年第4期。

⑥王春光:《青年回乡入乡行为的动力学分析》,《青年探索》,2023年第2期。

⑦李登旺:《把握县域人口流动新特点 分类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中国发展观察》,2023年第11期。

⑧袁剑,吴重庆:《青年县域城乡流动及对乡村振兴的参与研究》,《青年探索》,2022年第1期。

⑨刘丽娟:《新生代农民工就近城镇化形成机制、实践基础及发展路径》,《重庆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

⑩Urry J. ,Mobile Sociology,*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51,No. 1,2000,pp. 185-203.

⑪Sheller M. ,Urry J.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Environment and Planning*,Vol. 38,No. 2,2006,pp. 207-226.

村人口城乡间自由流动有利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①]，人口迁移流动对资源优化配置、区域均衡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作用[②]。有的研究特别关注到城乡人口两栖在融合城乡、振兴乡村中扮演的重要角色[③]。也有学者指出，应重视全面的要素流动、结构转型和功能整合，整体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县域城乡融合[④]。然而，关于不同类型的人口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如何？怎样分析其差异化作用机制？这些是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本文基于流动社会学视角，区别分析三类农村人口要素流动的实践表征，并把人口要素流动与其他流动要素相关联，探讨跟人口要素流动相关的城乡关系和空间结构的再生产。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a：人口要素流动有助于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提高。

H1b：人口要素流动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类型差异。进城定居型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城乡穿梭型流动的双向性能带动信息、技术等资源要素在城乡间流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三）人口要素流动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的空间差异

不同空间的人口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有研究指出推动城乡间双向人口流动可促进城乡一体化和深度融合，但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的作用存在时空异质性[⑤]。实际上，人口要素流动的三种不同类型在世代构成、职业分布、居住生活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而且县域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异质性对不同类型人口流动也有不同影响，从而使得人口要素流动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存在空间差异。其中，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是反映县域空间构成异质性的两个重要维度。

当前研究表明，经济发展因素是形成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空间格局的主要力量，而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县域承载能力密切相关，故人均GDP越高的县市越容易成为净流入活跃型[⑥]。经济发展状况对不同世代的人口流动产生的影响程度不同，在发达地区农民向区县集中进城过程中，析出的公共服务与进城空间高度契合青年农民工的内在需求[⑦]。教育资源分布状况也是县域空间格局的重要方面。县城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和较低的生活成本是推动农民进城定居的重要动力[⑧]。新生代流动人口对子女教育愈加重视，教育成为农民家庭实现进城的重要渠道之一，随着城乡教育资源分布格局的变动，流动儿童的数量日益增加[⑨]，有研究表明流入地城市的公共资源数量与可及性对儿童随迁决策有重要影响[⑩]。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a：人口要素流动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受到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显著影响。

---

①苏红键：《中国特色的县域城镇化：以城乡两栖促城乡融合》，《甘肃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②王桂新：《以人口迁移流动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国人口科学》，2023年第5期。

③王春光：《第三条城镇化之路：“城乡两栖”》，《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④袁方成，周韦龙：《要素流动何以推动县域城乡融合：经验观察与逻辑诠释——以佛山市南海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例》，《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⑤刘修岩，王彩艳：《城乡人口流动如何促进乡村振兴？——基于中国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浙江学刊》，2023年第1期。

⑥武荣伟，邬林果：《2000—2020年中国县市尺度流动人口地域类型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地理研究》，2024年第2期。

⑦黄佳鹏：《梯度进城：青年农民工的城市化实践》，《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⑧宋国恺，陈欣蕾：《农民工城镇化转变：从“乡—城”到“乡—县—城”——以农民工落户城市层级选择意愿为视角》，《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⑨陈雅川，武晓伟：《流动儿童家庭的亲子关系与家庭教育——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

⑩宋月萍，谢卓树：《城市公共资源对农村儿童随迁的影响》，《人口研究》，2017年第5期。

H2b:人口要素流动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受到县域教育资源不平衡状况的显著影响。

三、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

本文依托作者所承担202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社会学研究”,于2022年6—7月在全国首批11个“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所包含的试验区(县)中进行抽样开展了“城乡融合发展问卷调查”。即主要在山东济南历城区、青岛莱西市、江苏常州金坛区、浙江嘉兴桐乡市、江西鹰潭月湖区、四川成都温江区、河南鄢陵县开展问卷调查。每个县(市、区)抽取5个村(居)委会,每个村(居)至少抽取100个样本,经过后期统一录入和对数据清洗分析,共收集有效问卷3557份。本文以县域为空间分析单位,主要关注农村人口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故筛选出出生地为农村的人口,最终采用样本量为2740份。

(二)变量

1.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感知。本文将人们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感知作为被解释变量。城乡融合发展旨在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这些都跟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条件、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密切相关。本文运用居民对城乡生活环境和保障条件差距的主观感知来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量,主要包括城乡生活条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三个维度,其中城乡生活条件能够体现居民物质生活状况;基础设施是城乡空间融合的纽带,体现城乡间资源的可达性状况;而公共服务状况是城乡居民社会权益平等性的体现。本文选取调查问卷中三个相关题目,用“1—5”对选项答案赋值,其中“1”表示差距非常大、融合水平低,“5”表示差距非常小、融合水平高。将结果进行加总,得到样本对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感知的总得分。该变量为定序变量,总得分越高,意味着个体认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越高;总得分越低,意味着个体认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越低。

2. 人口要素流动类型。该变量包括三类情况,用问卷中户口登记地、居住地和工作地等三个问题进行筛选。第一类是农村留守型,即完全没有流动的情况,户籍、居住和工作均在农村没变化;第二类是进城定居型,即完成由乡入城完全改变的情况,户籍、居住、工作全部发生改变,均不在农村;第三类是城乡穿梭型,即在城乡间穿梭、往返,除了第一、第二类,剩余的归为第三类。

3. 个体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地位特征和城乡联系特征。与流动相关的个体人口学特征变量包括性别、政治面貌、世代、婚姻状况等;社会经济地位特征变量包括受教育程度、职业、住房状况等;城乡联系特征变量包括常用交通工具、互联网使用等。

表1直观地呈现了样本的各项基本特征。由此表可知,被调查居民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感知得分平均值为7.738,得分较低,表明样本中居民认为当前城乡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从人口流动状况来看,城乡穿梭型比例最高,最少的是进城定居型。从个体特征看,女性比例略高于男性;从世代来看,80后及以后年轻世代比例略低;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人口比例较高;从受教育水平来看,样本中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较低,初中学历的比例较高,大专及以上学历比例较低。

(三)方法

为更深入探讨人口要素流动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及其存在的类型差异与空间差异,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对三类人口要素流动进行描述性分析,探讨三种流动类型的特点及差异;其次,采用线性回归分析人口要素流动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分析流动类型差异和县域空间构成异质性在这一影响中所发挥的作用。本文构建线性回归嵌套模型,控制人口学、社会经济地位和城乡联系变量来检验人口要素流动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感知的影响,加入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和教育资源不平衡状况(人均学校数量)及其与人口要素流动类型的交

表1　样本基本情况　（N=2740）

变量	人数	比例(%)	均值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感知得分	2,740	100	7.738
人口流动类型			
农村留守型	1,105	40.33	
城乡穿梭型	1,189	43.39	
进城定居型	446	16.28	
个体特征			
性别			
男	1,287	46.97	
女	1,453	53.03	
世代			
60前	594	21.68	
60后	595	21.72	
70后	619	22.59	
80后	460	16.79	
90后及以后	502	17.22	
婚姻状况			
未婚	342	12.48	
已婚	2,398	87.52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702	25.62	
初中	949	34.64	
高中、中专、技校	605	22.08	
大专及以上	484	17.66	

互项，来检验人口要素流动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感知的影响是否具有空间差异。

四、实证分析与数据结果

（一）人口流动的类型特点

根据调查数据，首先对人口要素流动的类型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详见表2。本文将其分为农村留守型、城乡穿梭型和进城定居型三种类型，分别对应不发生城乡流动、城乡间往返和定居于城市三种流动状态。在所调查的样本中，农村留守型和城乡穿梭型比例相当，各占样本总数40%左右，进城定居型比例最小，不足20%，三种流动类型存在较大差异。

表2　人口流动三种类型分析　（N=2740）

	农村留守型(%)	城乡穿梭型(%)	进城定居型(%)
性别			
男	38.00	46.93	15.07
女	42.40	40.26	17.34
世代			
60前	59.76	27.27	12.96
60后	53.28	34.12	12.61
70后	37.80	42.33	19.87
80后	20.00	57.83	22.17

续表

	农村留守型(%)	城乡穿梭型(%)	进城定居型(%)
90后及以后	22.67	56.99	14.62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61.11	29.49	9.40
初中	43.41	44.38	12.20
高中、中专、技校	28.93	52.07	19.00
大专及以上	18.80	50.62	30.58
职业			
没工作、务农	60.98	26.96	12.06
打零工、个体户	26.61	59.14	14.25
企业工作	7.92	66.34	25.74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村)居工作	26.20	40.11	33.69
其他	31.07	53.40	15.53
住房状况			
两地均有房屋	25.68	61.64	12.67
两地均没有房屋	40.03	43.83	16.15
在农村有房屋	59.31	35.26	5.43
在城市有房屋	11.73	49.32	38.95
常用交通工具			
家用汽车	45.65	36.64	17.72
公交车	27.95	51.66	20.40
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	44.26	41.73	14.00
其他	50.00	35.11	14.89
互联网使用			
从不	62.80	27.73	9.48
很少	41.01	42.45	16.55
有时	40.16	44.20	15.63
经常	25.02	53.97	21.01

1. 农村留守型。如表2所示,这一类型女性及60前和60后所占比例较高,受教育程度偏低,职业以务农和无工作为主,且主要是在农村有房屋人群,在城市中有房比例很低。他们常用交通工具主要是家用汽车或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使用公交车等公共交通比例较低。这可能与农村公共交通不发达不便利有关,从不或很少使用互联网比例较高,这跟他们以老年人为主相关。

2. 城乡穿梭型。在调查样本中,这一类型所占比例最大,具有明显的男性多和年轻化特点,80后及以后在这一类型中所占比例较高。与农村留守型相比,这部分人群具有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或技术水平,主要职业多为非农工作,且在城市有房屋的比例很高。他们一方面能够享受城市的生活设施和资源,另一方面能够保留农村的宅基地和责任田,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他们最常用的交通方式呈现多样化特点,可能由于他们会根据流动距离和流动频率自主选择交通工具。经常使用互联网的人口在此类型中所占比例最大,他们能够从外界了解更多信息,处于一种积极活跃的状态。

3. 进城定居型。这部分人虽然出生在农村,但是当前户籍、工作、居住都在城镇,已经实现了由乡入城的转变。这一类型相比其他两种类型比例较低,其中男女比例相当,呈现中青年化的特点,受教育程度较高,因而相应的职业以企业或事业单位工作为主。这部分人群中,在城镇有住房和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比例较高,获取信息的渠道比较畅通。

(二)人口要素流动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分析

本文采用线性回归嵌套模型进行分析,表3报告了回归分析结果。模型1是分析人口要素流动

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感知的直接影响，模型2是仅加入性别、婚姻、世代等人口学变量，模型3、模型4逐次控制了社会经济地位（包括受教育程度、职业、住房状况）和城乡联系（包括常用交通工具、互联网使用）等变量，逐步考察各变量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

模型1显示相较于农村留守型，城乡间发生流动人员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感知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在城乡穿梭型流动和进城定居型流动均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感知有正向作用。这表明在调研的县域范围内，人们在城乡间有更多流动，对所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评价越积极的可能性更高。模型2中加入人口学变量，结果显示城乡穿梭型流动和进城定居型流动系数有所下降，尤其是城乡穿梭型流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模型1中的显著效应可能部分受世代这一人口学变量影响。而模型3中控制人口学变量，纳入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后，城乡穿梭型流动的显著性重新显现，城乡穿梭型流动和进城定居型流动系数在模型3、4中保持稳定，这表明人口要素流动的影响效应主要受社会经济地位影响，而非由人口学特征驱动。因此，在假设居民主观感知能真实反映其所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前提下，可以得出人口要素流动有助于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高，由此验证了假设1a。

同时也发现，在四个模型中城乡穿梭型流动的回归系数均低于进城定居型流动，这表明二者在影响程度上仍存在一定差异，由此验证了假设1b，即进城定居型流动对于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更大促进作用，这可能由于进城定居型人群的市民化程度更高，更能促进县域城镇化发展进程。

本文采用Ologit回归分析作为稳健性检验，分析结果是一致的，即在控制了人口学、社会经济地位、城乡联系变量后，城乡穿梭型流动和进城定居型流动对城乡融合水平感知的影响仍为显著。

表3　城乡融合发展感知水平的影响因素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人口要素流动（参照：农村留守型）				
城乡穿梭型	0.411**	0.201	0.353*	0.366*
进城定居型	0.705***	0.570**	0.767**	0.781**
性别（参照：女性）		−0.050	0.033	0.041
婚姻状况（参照：未婚）		0.110	0.221	0.247
世代（参照：60前）				
60后		0.182	0.281	0.373
70后		0.170	0.389	0.555*
80后		0.631**	0.938***	1.145***
90后及以后		0.969***	1.281***	1.514***
受教育程度（参照：小学及以下）				
初中			−0.109	−0.029
高中、中专、技校			0.106	0.211
大专及以上			−0.645*	−0.513
住房状况（参照：两地均没有房屋）				
两地均有房屋			−0.685*	−0.637*
在农村有房屋			0.125	0.148
在城市有房			−0.195	−0.167
职业（参照：没工作、务农）				
打零工、个体			−0.603***	−0.567***
企业工作			0.208	0.274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村）居工作			0.178	0.231
其他			1.672***	1.659***

续表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常用交通工具(参照:其他)				
家用汽车				−0. 307
公交车				−0. 529
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				−0. 483
互联网使用				−0. 107
常数项	7. 445***	7. 135***	6. 974***	7. 424***
R^2	0. 005	0. 012	0. 032	0. 034
样本量	2740	2740	2740	2740

注:* p<0.05, ** p<0.01, *** p<0.001

(三)人口要素流动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的空间差异效应

表4中加入县域空间构成因素变量以及与人口要素流动状况的交互项,探讨人口要素流动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的空间差异效应。其中,模型1、2是在控制个体人口学、社会经济地位、城乡联系变量的基础上,分别加入所在县域人均GDP和人均学校数量,探讨所在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及教育资源分布状况对人口要素流动影响效应的作用。模型3、4是在模型1、2基础上分别加入人口要素流动类型与所在县域人均GDP、人口要素流动类型与所在县域人均学校数量的交互项。模型1证实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对个体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感知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即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程度越高。模型2揭示了县域教育资源分布与个体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感知之间的密切关系,反映出所在县域人均学校数量并不是越多越好,教育质量差距较大也会导致个体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感知度较低。

模型3结果显示,居住地所在县域人均GDP越高,进城定居型流动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感知度就越高,由此验证了假设2a。这一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县域,进城定居型人口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可能更强。模型4结果表明,所在县域教育资源分布状况与城乡穿梭型流动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感知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由此验证了假设2b。但其相关系数为负,这表明所在县域人均学校数量越多,城乡穿梭型流动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感知度就越低,即认为城乡差距越大。这一结果可能由于县域教育资源数量越多,城乡学校间的差异越能被明显感知到,特别是城乡穿梭型流动人群中因为子女教育发生流动的较多,更能明显感受到城乡教育资源的差别,对城乡差距感受明显,因而多倾向于消极感知。由以上结果可知,人口要素流动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性。

表4　人口要素流动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的空间差异效应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人口要素流动(参照:农村留守型)				
城乡穿梭型	0. 381*	0. 557**	0. 087	1. 137***
进城定居型	0. 829***	0. 962***	−0. 253	0. 797*
性别(参照:女性)	0. 048	−0. 005	0. 060	0. 002
婚姻状况(参照:未婚)	0. 259	0. 244	0. 273	0. 287
世代(参照:60前)				
60后	0. 353	0. 308	0. 374	0. 310
70后	0. 580*	0. 539*	0. 600*	0. 556*
80后	1. 188***	1. 149***	1. 215***	1. 184***
90后及以后	1. 545***	1. 506***	1. 576***	1. 511***
受教育程度(参照:小学及以下)				

续表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初中	−0. 087	0. 065	−0. 083	0. 040
高中、中专、技校	0. 134	0. 341	0. 143	0. 305
大专及以上	−0. 598*	−0. 423	−0. 583	−0. 477
住房状况(参照:两地均没有房屋)				
两地均有房屋	−0. 683*	−0. 713**	−0. 648*	−0. 728**
在农村有房屋	0. 153	0. 129	0. 161	0. 126
在城市有房	−0. 224	−0. 268	−0. 212	−0. 261
职业(参照:没工作、务农)				
打零工、个体	−0. 583**	−0. 573**	−0. 554**	−0. 591**
企业工作	0. 249	0. 239	0. 250	0. 271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村)居工作	0. 224	0. 136	0. 263	0. 151
其他	1. 616***	1. 539***	1. 610***	1. 561***
常用交通工具(参照:其他)				
家用汽车	−0. 319	−0. 345	−0. 308	−0. 357
公交车	−0. 537	−0. 566	−0. 583	−0. 586
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	−0. 473	−0. 368	−0. 497	−0. 372
互联网使用	−0. 098	−0. 109	−0. 103	−0. 109
所在县域人均GDP	0. 042*		0. 009	
所在县域人均学校数量(所/万人)		−0. 494***		−0. 252
交互项				
人口要素流动×人均GDP(参照:农村留守型×人均GDP)				
城乡穿梭型×人均GDP			0. 029	
进城定居型×人均GDP			0. 112*	
人口要素流动×人均学校数量(参照:农村留守型×人均学校数量)				
城乡穿梭型×人均学校数量				−0. 498*
进城定居型×人均学校数量				0. 079
常数项	7. 027***	7. 873***	7. 322***	7. 617***
R^2	0. 036	0. 044	0. 037	0. 047
样本量	2740	2740	2740	2740

注:* p<0.05, ** p<0.01, *** p<0.001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城乡融合发展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流动社会学视角探究了县域空间内人口要素的流动类型特征及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分析了这种影响存在的流动类型差异和县域空间差异效应,可得出如下结论:

1. 县域空间内人口要素流动呈现出多元化、常态化特征。我国在以往城乡二元结构制约下,城乡人口流动受到极大限制。近年来随着这种二元体制的突破和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乡人口流动呈现多元化、常态化的趋势。而城乡人口要素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部分,其流动对突破城乡空间壁垒,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县域空间内,人们越来越多地穿梭于城乡之间,极大地促进了城乡要素交流,打破了城乡居民的空间分隔,城乡差异逐步缩小。当然,我们看

到,城乡人口要素流动呈现出多元化的不同特征,形成了不同的流动类型。这既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为人们在城乡间工作和生活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从而也有助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2. 人的要素流动作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促进了城乡各要素合理流动,有助于城乡空间结构关系的调整与整合。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社会体制机制改革和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大批农村人口实现了非农转移,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农民工进城现象,由乡到城的人口转移构成了中国城乡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因此,这一时期城镇化率得到快速提升。但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乡发展的不平衡矛盾并没有得到很大缓解,城乡差距依然较大。而要改变城乡发展不平等的结构性矛盾,需要解决制约城乡融合发展的深层问题。其中,如何促进城乡要素合理流动就是重要方面,特别是人的要素的自由流动。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县域内不同类型的流动人口虽然对城乡融合水平的感知存在差异,但是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助推城乡融合发展已成为基本趋势。因此,我们应重视人的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

3. 县域人口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存在空间差异性,应合理推进县域城乡空间资源的调整与重构。中国地域广泛,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县域在我国城乡社会空间资源分配中具有特殊地位和意义[①]。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实施的城市优先发展政策,致使农村发展资源和公共投入不足,县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不足,城乡居民之间在经济收入、生活条件和社会服务保障等方面差距明显。所以,我国的城乡融合发展需要面对县域发展的现实问题,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推进相关事宜。其中,包括重视促进县域城乡人口的双向自由流动,通过整合人口、土地、资源等要素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发展。同时,完善县域基本公共服务和发展环境,为人们在城乡间流动创造更好机会。

当然,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中,人的要素流动虽是不可替代的重要促进力量,但是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流动因素还包括其他方面,如资本、信息、技术等要素的流动也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需要综合考量各要素的整合性作用,以系统认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制。

[责任编辑:王文娟]

①林聚任:《以高质量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年第21期。